

专题

← (上接 11 版)

蔡铁鹰认为,吴承恩与许多写书人一样,在故事的设计中保留了自己的生活印记。“这个故事是百回本中的一个原创故事,很完整,足足占了两回文字,这个故事的这个作者就是担任过荆府纪善的吴承恩。”

第二,多数与会者认为,作者应是文人。但也有人提出,作者应是道教中人。

蔡铁鹰经过 20 多年的考订和田野调查,撰成了 63 万字的《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集》,其中《吴承恩集》辑入了吴承恩全部存世诗词文稿,并做了系统的校订笺注。蔡铁鹰说:“我几乎读了吴承恩存世的所有作品,最大的感觉是,他的语言风格和《西游记》的文风最为相近。”

对此,李天飞有不同看法。他引用天启《淮安府志·近代文苑》对吴承恩的评价“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再对照《西游记》中的一些诗词,认为并没有体现出很高的文学造诣。比如,他将吴承恩给丁翥写的祝寿套曲,与《西游记》玉兔公主的《喜会佳姻》相比,“仙凡立判,吴承恩就算发挥失常,似乎也不至于此”。

对此,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教授伍大福提出,《西游记》中之所以诗词水平参差不齐,正是因为“作者是文人,才能用不同的笔法写作”。蔡铁鹰表示,李天飞考证功夫扎实,但评判一部书的作者是谁,要有全局眼光,“不能拿微观案例做宏观结论”。

而后,李天飞又提出,《西游记》中有许多道教色彩的内容,讲的是道教故事,这与《吴承恩集》中体现出来的知识兴趣并不吻合。例如,书中多次引用全真教文集《鸣鹤余音》中的段落,全书隐然贯穿一条借“金丹大道”暗喻取经历程的线索。南开大学教授陈洪也认为,《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确实经历了一个道教化的过程。

对此,竺洪波指出,《西游记》本就是一本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的书,儒释道、抑或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西游记》揽入独家彀中。蔡铁鹰则认为,说吴承恩不懂道教是一种主观猜想,且作者写到道士时态度不恭,“肯定不能是道教中人”。他推测,从唐代开始流传的《西游记》故事,约在明朝嘉靖初年被加入了道教内容,吴承恩在成书时予以保留。

第三,与会者提出,《西游

记》作者应该对志怪小说感兴趣,甚至有这方面的写作经验。

蔡铁鹰表示,在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篇《禹鼎志序》,说“余幼年即好奇闻”,“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于是作《禹鼎志》。序中还说:“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他认为,这种文学理念与人生道义与《西游记》的写作异曲同工。

李天飞指出,同样是在这篇序中,提到《玄怪录》《酉阳杂俎》对《西游记》产生了影响,而且《西游记》流传到吴承恩的时代已数百年,“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百回本《西游记》跟吴承恩有关,那么他对这本书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足以被称为是作者吗?还是他更多的是做文字上的改定,类似今天的责任编辑?”

百回本《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点与会者们达成共识。在吴承恩能否被称为“作者”问题上,多数人持肯定态度。蔡铁鹰认为,《西游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都是流传甚广的传统故事,而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之所以被认定是“作者”,不仅因为他们在平实的民间故事中,注入了斐然的文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故事的现实意义。据他判断,百回本《西游记》中三分之一的故事是由传说加工而成,如沙僧的形象、火焰山的故事等;三分之一是将原本有梗概的故事完整化,如白骨精、红孩儿的故事等;还有三分之一是原创作品,如玉华国故事等。

“我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讨论在 30 年前就应该结束了。”蔡铁鹰说,当年章培恒先生论文中提出的疑问,在之后 10 多年的论辩中都得到了解答,而目前所谓的质疑,多为臆想推论,称不上是证据,“如果要推翻吴承恩是百回本的作者,那至少回答下面问题中的一个:第一,作者是谁?第二,吴承恩的《西游记》写了什么?”

当然,“疑吴派”和“骑墙派”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在他们看来,在反驳当年章先生质疑的证据中,很多也是带着“作者是吴承恩”的观念进行推演,论证过程也是提出另一种假设和可能性,缺乏真正的“铁证”。

那么,《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一观点,最早是谁提出来的?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呢?

竺洪波表示,清代就有人提出这个观点,但真正对后世产生影响,是“五四”时期



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万历本
页面《禹鼎志序》



根据出土头骨复原的吴承恩半身像(张建军制作)

鲁迅和胡适的考证。二位先生在清人纪昀、钱大昕及吴玉搢、丁宴、阮葵生等人的考辨基础上,爬梳史料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章培恒先生指出,“他们的考证并不是极其周密的”,但由于二者的地位,舆论风向就此形成。1920 年代,首次出现了署名为“吴承恩作”的铅印本《西游记》。上世纪 30 年代,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学者又不断进行引证、申述,“吴著说”几乎成了学界共识。在近世刊行的百回本《西游记》上,作者署名几乎都是吴承恩。1986 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片头打上了“吴承恩原著”,使得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邱处机、李春芳的“提名”漏洞

就热门候选人的“提名”顺序先后来说,吴承恩并非第一个。

明代梓行的《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多沿用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惯例,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告作者佚名。至于佚名的原因,竺洪波认为有二:一是当时小说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作者不愿署名;二是《西游记》内容广袤,其中不乏讽刺“今上”和时政等敏感话题,书商不敢署名。

到了清代,第一个热门候选人出现了——“全真七子”之一的元初道士邱处机(邱本作丘,因讳孔子改)。

竺洪波说,其实早在明代,道教徒伍守阳(1574—1644?)就在《天仙正理》卷下写道“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但这一说法并未在刊印本上得到体现。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道教徒汪澹漪刻成了《西游记》评点本《西游

证道书》,在卷首放了篇号称元代大文豪虞集写的《西游记原序》,内有“此国初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并称这么说是依据一本久已失传的“大略堂古本西游”。在《原序》后,汪澹漪又添置了邱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两则附录,分别介绍邱处机生平和玄奘的取经史实。通过三者互证,汪澹漪让“邱作说”风靡了 200 多年。现在所能看到的七种清代的《西游记》版本上,无一例外都署邱处机为作者,有的还径直标明“邱长春真君著”。不过,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大略堂古本西游”子虚乌有,虞集的序系伪造。

其实,抛开《西游证道书》的真伪不谈,邱处机的道教身份与玄奘取经的佛教题材具有先天矛盾,“邱作说”本就容易招来质疑。比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西游记》中发现了“多明制”的现象。他提出,邱处机是宋元之际人,怎么会写出锦衣卫、司礼监、会同馆、东城兵马司等诸多明代的官制与官职?再如,乾嘉学派的钱大昕于清乾隆六十年在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发现并抄出了邱处机二卷本《长春真人西游记》。经考证,该书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师操刀的一本游记,主要记述邱处机率领十八弟子历时四年远赴雪山参见成吉思汗的途中见闻,以及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场对话,总共两卷不足 5 万字。竺洪波认为,这部《长春真人西游记》许是“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一语的出处,但它与《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实为同名异书。

不过,现在学界还有人坚持“邱作说”,主要辩护理由有两条。理由之一是邱处机可能是两部《西游记》的共同作者。竺洪波认为,根据古代文人“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为文追求,一人撰写两部同名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由

之二是《西游记》是世代累积之作,邱处机所作或为某一原始的《西游记》。竺洪波表示,首先“原始西游记”与百回本《西游记》不是一回事,且从唐五代开始的“原始西游记”都“名花有主”,均与邱处机无关。竺洪波感到,钱大昕指“邱作说”为“邱书燕说”,鲁迅斥之为“不根之谈”,“并非虚妄”。

除了邱处机,还有个热门一时的候选人是李春芳。

2000 年,沈承庆遗作《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出版,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他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李春芳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号“华阳洞主人”,这与世德堂本上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相互印证。二是《西游记》第 95 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他认为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遗迹”之意。不过第二条理由过于牵强,学界很少讨论。

关于第一点,蔡铁鹰表示,没有任何文献显示“华阳洞天主人”到底指谁。即使“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他的工作也是“校”,即校勘文字,这与著、作是两个概念。另外,李春芳是嘉靖朝状元,仕途顺利,没有写《西游记》这种谐谑当朝文字的“作案动机”。而且,结合文献对李春芳的记载及其文学作品来看,他为人恭敬、谨慎,不说偏激的话,是写不了《西游记》的。

李天飞告诉记者,目前对世德堂本的问世时间有两种判断:一是 1530 年代,结合吴承恩(约 1500—约 1582)

(下转 13 版) ➔